

摘 要

2000 年以来，全球慈善界在推进以消除极端贫困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慈善界和各国政府通力合作下，消除极端贫困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在推进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方面，通过资助环保科技创新和创伤修复计划，全球慈善界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粘合剂，促使政府和民间紧密合作，共同化解气候变暖等人类面临的挑战。

2015 年，全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达成，是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里程碑，也是全球慈善界的重大历史机遇。未来 15 年，在推进包含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等 17 个目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全球慈善界可以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慈善界的参与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慈善界的合作，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在过去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通过联合基金的方式，让东西方慈善家携手，为共创绿色新未来投资，是未来东西方慈善家合作的重大机遇。与此同时，更多的跨界合作，及青年、女性群体参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很有必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也显得十分迫切。

回顾千年发展目标的历程，展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可以看到，全球慈善界正处在关键历史时刻。慈善界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全面纳入新慈善运动，发挥勇于开拓创新的传统，并和政府、企业等跨界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迈入善经济时代，让我们的后代永享蓝色星球和绿色未来。

Abstract

Since 2000,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have supported countries to reach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Philanthropist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globe have cooperated to decrease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By sponsor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s, the global charity sector has become key to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Philanthropy organizations'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as been conducive to addressing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society.

In 2015, the world agreed to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s not only a major milestone for addressing glob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sues, but also a notabl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global charity sector as well. Over the next 15 years, in order to reach the 17 goals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eradicating poverty, eradicating hunger,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urgent ac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e charity sector will need to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arity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around the topic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new innovation. Over the last decade, joint funding between philanthropist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have allow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to support a green future. This demonstrates a positive trend and should be continued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mor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more youth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will be necessary to address urg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By review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looking ahea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e can now see that the charity sector is at a decisive moment in history. The charity sector should integr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o new charity campaigns, follow best practices, encourage innovative ideas, launch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 order to bring the world into the Charity Economy (wher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are central) and support a sustainable plane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share.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慈善运动迅猛发展

1.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事关人类未来

2016年1月1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生效，各国自1992年以来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上的努力进入到新阶段。新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今后15年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新议程范围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社会、经济和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治理相关的重要方面。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后，全球在环境保护和发展领域最为重大的里程碑之一。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首脑会议”）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的里约峰会也开启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进程，通过了《21世纪议程》，并形成了环境保护领域的3个重要公约，即《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2000年9月5日召开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该宣言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MDGs）。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到期，全世界在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教育和降低母婴死亡率等多个领域内实现了目标，但也在某些领域内并没有达到设定的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并不平衡，不同国家和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和地区间的落实情况仍存在差异。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全体成员国正式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



图-1：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在千年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大规模消除贫困的基础上，并面临着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等新的问题可能会对人类消除贫困的成果带来巨大威胁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未来 15 年人类发展方向上的再次携手合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除核心关注议题依然为消除贫困外，增加了在和消除贫困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其他因素。更加强调包括政府间、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并将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的参与视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力量。

与千年发展目标中个别目标实现手段的单薄无力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从筹资、技术、能力建设、贸易与系统等提出了落实各项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它指出要建立更加广泛、有力的发展伙伴关系，在坚持南北合作为主渠道的前提下，为国际发展合作注入更多动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它强调要把各国政府、

私营部门、民间社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行动体召集在一起，调动现有的一切资源来落实目标和具体目标。它将技术促进机制进一步具体化，提出该机制由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机构间任务小组、多利益攸关方协作论坛和网上平台组成。

相比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监测和审查执行情况的框架。议程明确提出将系统地跟进和审查该议程今后15年的执行情况，确立一套全球指标，定期对国家、区域和全球的执行情况进行进展审查。提出通过国家报告来评估目标实施进展。这些跟进和审查行动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切实落实的重要保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指标综合了扶贫、环境保护、健康、及教育等众多领域，其中有7个指标直接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本报告重点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内慈善家行动，重点对与可持续发展中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及可持续人居环境三个领域进行回顾及展望，并围绕消除贫困这一核心目标，通过回顾全球慈善界及民间社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上的贡献，分析未来发展的趋势。

2. 慈善界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消除贫困上，全球慈善界做了大量工作。在消除贫困及社会不公平方面，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界在消除贫困及环境持续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1 慈善界对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资助稳步上升

在传统的慈善格局中，环境保护领域的资助并不占主流，规模极其有限，但是近年来情况已有较大改观。从美国基金会中心网和环境资助者联盟的年度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环境保护资助上的数据和分析。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汇集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基金会捐赠数据，但分类还相对宽泛，我们从中国慈善发展年度报告中，对中国近五年基金会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进行了分析。

美国对可持续领域的慈善捐赠稳步增长。截至2015年，捐赠达3732亿美元，

捐赠占 GDP 比重接近 2.1%，其中，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发布的美国捐赠数据显示，捐赠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资助占比接近 3%¹（见图-2），由此可以估计，美国在环境领域每年直接资助接近 100 亿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捐赠人向基金会的捐赠也有可能用于环境保护领域。由美国资助型基金会组成的环境资助者联盟对联盟内的资助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估计了美国资助型基金会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大致为 30 多亿美元。美国环境捐赠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等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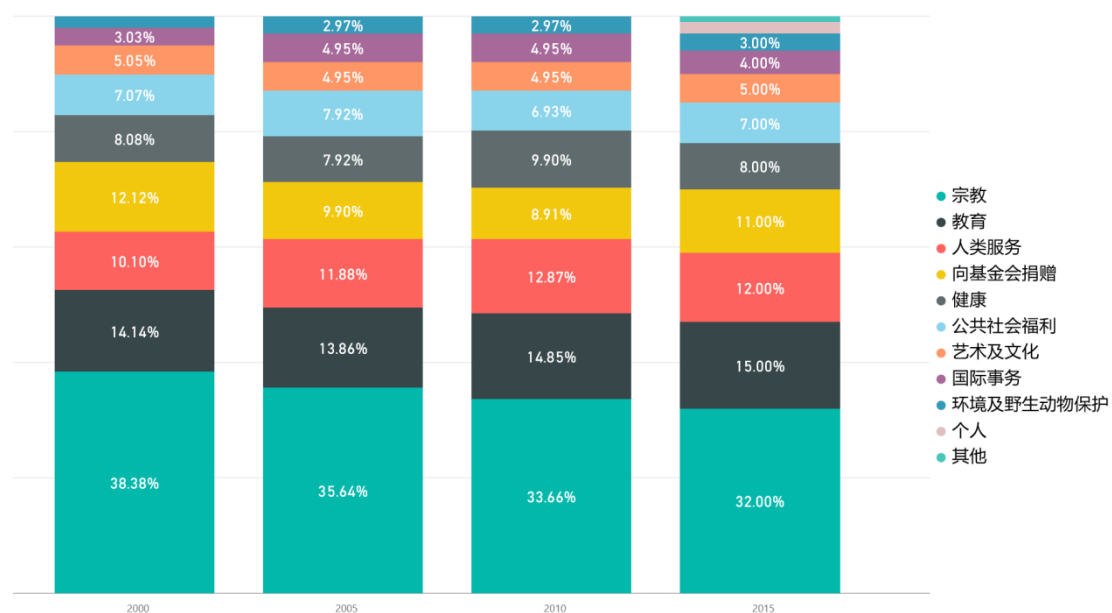


图-2：2000-2015 年美国公益捐赠情况

中国慈善捐赠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截止 2014 年，全国慈善公益捐赠总额达 1058 亿元人民币，但与 GDP 总量相比，捐赠占 GDP 的比重很低，仅为 0.17%，捐赠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和减灾防灾领域。在生态保护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捐赠占比较小，2014 年，生态环境捐赠只有 7.3 亿元人民币，仅占总捐赠额的 0.7%²（见图-3）。中国基金会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已经有超过 5000 家基金会（见图-4），而专注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基金会所占比率不大，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分析，共有 51 家基金会把环境保护作为主要的资助领域³，在这些基

¹ Giving USA Foundation, 2016, Giving USA: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5.

² 杨团, 2016,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³ 基金会中心网, 2015, 《自然保护领域基金会发展趋势分析》, 网址:

金会中，最核心的工作领域为森林植被恢复及造林等，例如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由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的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中仅有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基金会、SEE 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的工作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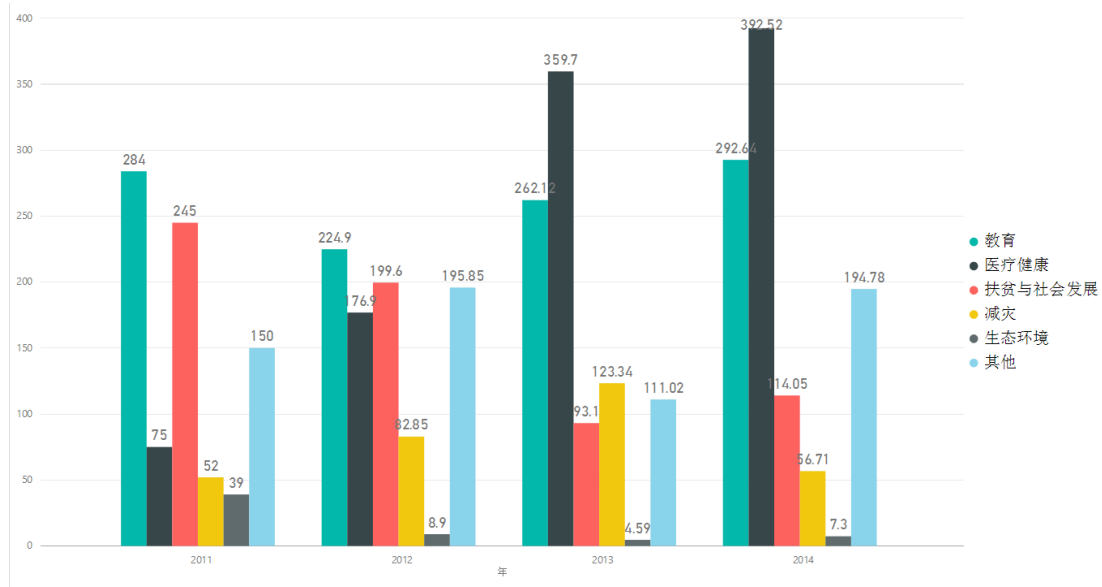


图-3：2011-2014 年中国捐赠情况（单位：亿元人民币）

欧洲慈善家在环境可持续发展上的资助，我们对列入《2014 年全球慈善百杰榜》的前 20 家欧洲慈善家族进行了查询，其中有 5 家在官网中明确提及其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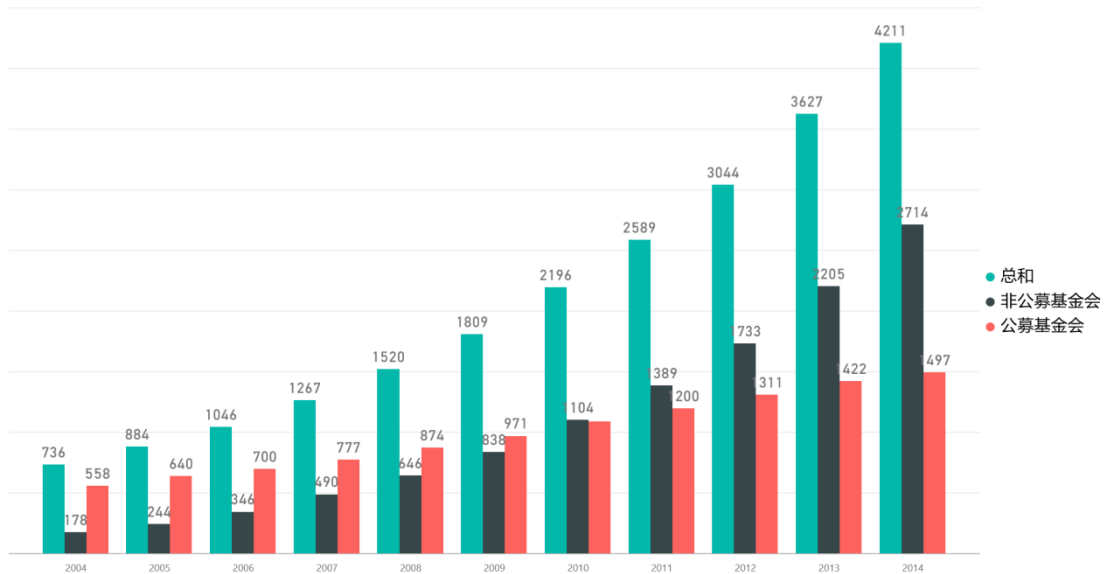


图-4：中国基金会增长情况

2.2 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相关领域慈善的迅速发展

基金会中心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建立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资助平台，对 2010 年-2013 年间全球慈善界的投资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期间全球对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 17 个目标之下，共提供了 973 亿美元的资助，其中比尔及梅琳达·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是最大的资助机构（见附录-3）。通过对这几年慈善界的资助和国家间发展援助的比较发现，基金会的资助已经接近官方的发展援助，体现出慈善界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内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据保守估计，全球慈善界在 2030 年前，将需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364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 7 个目标和环境可持续直接相关。如果只看这 7 个目标上的资助，在 2010 年到 2014 年期间，全球基金会投入的资金总额约 200 亿美元，其中在可持续城市和陆地生态系统保护的投入最高。

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企业家和公众参与慈善捐赠的意愿增强，特别是中国企业家在环境保护上的承诺及投入增加，投入方式也开始多元化。2012 年 6 月，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承诺未来十年向生态治理捐赠 100 亿元人民币⁴。2014 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宣布捐赠他们拥有的阿里巴巴集团 2%的

⁴公益时报，2013 年 2 月，《中国现百亿级捐赠承诺》，网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2582.html>

股票成立信托⁵，未来信托的资助领域包括环境保护，该捐赠承诺按照当时阿里巴巴的上市价格估算，为 245 亿元人民币。2016 年 4 月 18 日，腾讯集团创始人马化腾宣布捐赠 1 亿股所持股票成立公益信托，并陆续注入其正在成立的慈善基金会，未来该基金会重点资助领域包括环境保护，该笔承诺捐赠按照当时腾讯集团的股票价格估算，为人民币 140 亿元⁶。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公益慈善家在环境领域的资助将迅速增加。

3. 慈善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领域的贡献

3.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慈善界及非政府组织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1948 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拥有 15000 余名自然保护科学家及保护工作者组成的 6 个委员会，并有 200 多个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员，1000 余家非政府机构会员。IUCN 的工作区域遍及全球，在全球 4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办公室。除此之外，著名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保护国际（CI）、鸟类保护国际（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都在全球开展自然保护工作。全世界各地的植物园、动物园也在自然保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英国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等，在全球的物种保护上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因为人类的发展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及其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还有相当比重的贫困人口直接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带来的食品、药品等资源，而每一个地球居民都依赖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空气、水、土壤、休憩等等。千年发展目标宣布至今，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部分旗舰物种种群增长，保护地面积持续增加。但是，生物多样性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及城市化的背景下，物种及关键栖息地的丧失依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巨大威胁。

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层面的多样性，其中包括基因、物种和栖息地。而衡量

⁵新华网，2015 年 9 月，《2014 年中国捐赠突破千亿，马云蔡崇信创记录》，网址：http://www.js.xinhuanet.com/2015-09/19/c_1116614790.htm

⁶腾讯网，2016 年 4 月，《马化腾捐 1 亿股腾讯股票做慈善》，网址：<http://news.qq.com/a/20160418/054437.htm>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可以从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状况来进行评估。

在栖息地保护上，至 2014 年，全世界 15.2%的陆地及内陆水体保护区和 8.4%的海洋保护区得以保护。在关键的生态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取得了较大进展，全球毁林比率大幅下降，全世界近 30%的土地面积被森林覆盖⁷。近几年来，全世界森林减少的趋势得到缓解，这归功于某些区域毁林的减少和某些区域大量的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以及许多地区森林植被的自然更新。

但是，从物种保护上看，全球生物多样性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作为衡量成千上万种脊椎动物种群规模变化趋势的指标，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开发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PI）从 1970 至 2010 年间显示了 52%的下降率⁸。特别是两栖、爬行类动物，同时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此外全球海洋渔业过度捕捞在加剧，严重威胁到海洋生态安全和生计。经过 40 年的持续捕捞和恶化，过度捕捞不仅减少了渔业量，也损害了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并将最终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在 WWF 发布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地球生命力指数中可以看到，在物种层面，中国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极大的威胁，1970 年至 2010 年，中国陆栖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 49.71%。40 年间中国两栖爬行动物种群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本世纪初逐步放缓，至 2010 年指数下降了 97.44%。1970 至 2000 年间鸟类种群数量相对恒定，至本世纪初显著上升，并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

在中国，民间组织参与自然保护的形式起源于国际环保组织的在华办公室。1980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受邀前往中国进行大熊猫及栖息地保护项目。1996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正式在华设立办公处。1998 年，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云南开展大河国家公园项目，正式进入中国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2002 年，保护国际在中国西南山地开始进行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截止目前，这几家国际组织依然活跃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例如，大自然保护协会启动的中国生物多样性蓝图项目，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2030 年行动计划提供了大量

⁷联合国，2015，《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网址：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pdf/MDG%202015-C-Summary_Chinese.pdf

⁸世界自然基金会，2014，《地球生命力报告》，网址：

<http://www.wwfchina.org/content/press/publication/2014/LPR2014summaryEN.pdf>

的科学和数据基础。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资金主要来自国际捐赠，年预算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SEE 基金会是中国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大的资助者之一，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也在该领域内有一定的投入。而过去几年，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内的慈善家走出去的趋势比较明显，特别是和国际环保组织的合作比较密切，通过合作形成国内的行动力量。例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先后向大自然保护协会进行捐赠，设立了中国全球保护基金，支持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项目。桃花源基金会的成立，代表着中国的慈善家已经开始深度参与中国及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案例-1 爱德华·威尔逊、珍妮·古道尔：科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启蒙

爱德华·威尔逊是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生物学家和保护学家。他被誉为“世界生物社会学之父”和“生物多样性之父”。威尔逊教授是世界最知名的蚂蚁研究学者。1992年，威尔逊教授出版了《缤纷的世界》，阐释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实践问题，并使之成为一种标准。爱德华教授在建立包含190万物种的网络物种百科全书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爱德华教授还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的理论和概念，去保护那些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

威尔逊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由威尔逊教授在自然保护的影响力和思想体系所引导，基金会在莫桑比克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建立了威尔逊生物多样性实验室，支持莫桑比克本地的科学家从事长期研究，并记录戈龙戈萨的丰富生物多样性。该实验室是非洲第一个可以永久存放戈龙戈萨动植物标本的设施，实验室永久记录了每一个物种在公园的痕迹。



图-5： 爱德华·威尔逊（左一）

珍妮·古道尔是一位英国灵长类学家、生态学家和人类学家，并是联合国和平信使。她是全球保护黑猩猩和他们栖息地的领导者，是全世界一流的黑猩猩保护专家，她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进行了长达55年的黑猩猩群体生态研究。她发起建立了珍妮·古道尔研究会及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致力于自然保护和动物福利保护议题。她从1996年开始，发起并服务于非人权项目。

1977年，古道尔建立了珍妮·古道尔研究会，支持贡贝的研究，研究会在全球建立了19个办公室，研究会在非洲的创新、社区为中心的保护和发展项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直到今天，古道尔博士几乎将其全部的时间投入到黑猩猩和环境保护的倡导之中。



图-6：珍妮·古道尔

威尔逊教授和古道尔博士，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鼻祖，他们从科学研究开始，为全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启蒙，让社会知晓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开创者。他们也是第一批行动者，用科学推动生态的保护。

案例-2 西尔维娅·艾尔：深海女王及蓝色使命联盟

西尔维娅·艾尔是国家地理探索学者、著名海洋学家、探险家、作家，被纽约时报誉为“深海女王”，被图书馆联盟誉为“在世传奇”，被时代周刊誉为“星球英雄”。

她是海洋长老会的创始人。海洋长老会是一家囊括了全球海洋及海洋野生生物保护全球领袖的独立机构。海洋长老会的成员们用他们的影响力，在科学和数据的支持下，推动海洋的保护，致力于海洋栖息地和海洋野生生物的保护，并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及物种多样性。海洋长老会还和众多海洋机构一起，鼓励、认可及表彰这些海洋保护组织的成就。

艾尔博士还发起了蓝色使命计划，唤醒公众对海洋的关注，让公众认识到海洋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从海山山脉到海洋浅礁，蓝色使命计划希望能够将全世界的海洋保护区从目前的 4%增加到 2020 年的 20%。在艾尔博士的领导下，蓝色使命计划团队实施了一系列的海洋远征去提升公众对海洋的认识和开始关注海洋。蓝色使命还支持了许多海洋保护 NGO，和他们一起促进海洋保护的公众意识。目前，蓝色使命联盟已经有超过 100 家知名的海洋保护团队及兴趣相同的团队，包括大型的跨国企业以及众多进行重要研究的科学家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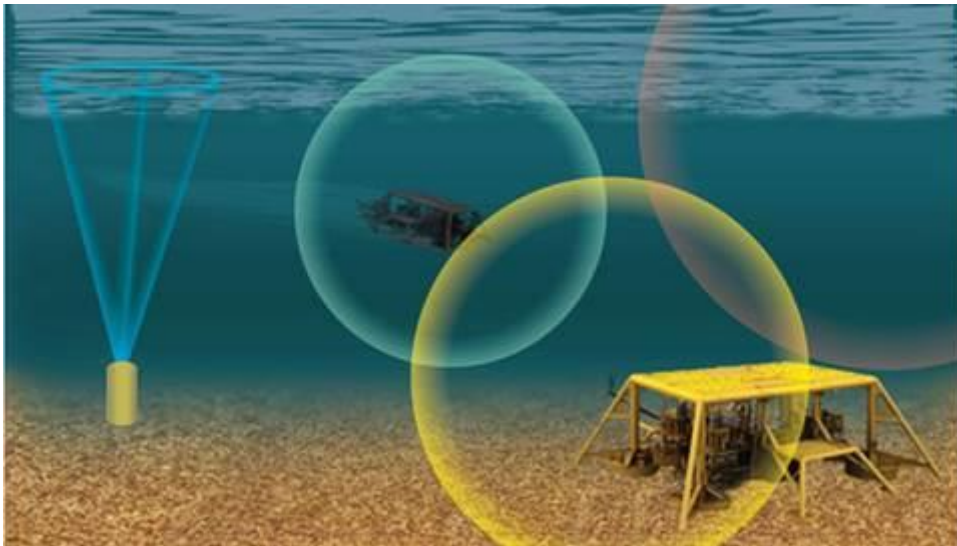


图-7： 海洋工业化导致噪声污染正在加剧

案例-3 特纳基金会：野生物种保护及清洁能源倡导者

特德·特纳，美国有线新闻网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的媒体大亨，和致力于环境问题解决的慈善家。1997年，特纳承诺捐赠 10 亿美元成立联合国基金会，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笔的捐赠之一。特纳担任了联合国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

从 2010 年开始，联合国基金会领导支持了全球清洁炉灶联盟，鼓励大规模使用清洁安全炉灶，替代使用传统明火炉灶。清洁炉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降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联盟构建了一个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在内的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使用清洁高效炉灶。从 2010 年到 2016 年，联盟中的伙伴关系大幅增加，使孟加拉国、中国、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危地马拉等超过 6300 万户采用清洁炉灶和燃料。联盟还将继续为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技术支持，并在 2020 年实现 1 亿家庭使用清洁高效炉灶的目标。



图-8：特纳家族

除此之外，为了响应联合国人人享用可再生能源的倡议，联合国基金会还发起了全球能源接入从业者网络，由 191 个国家的 1500 个成员组成。网络关注通过新技术的采用和创新的金融及商业模式，来消除有效、可信及可承受的能源服务的市场壁垒，识别并传播最佳实践，倡导普惠能源。联合国基金会将和联合国、政府、私营部门及 NGO 一道为 2030 年实现更加宏伟的普惠能源目标。

特纳基金会，及下属的特纳濒危物种保护基金和特纳生物多样性保护分部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特纳基金会是特纳濒危物种保护基金和特纳生物多样性保护分部的主要资助方，为美国数百家环境保护组织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案例-4：老牛基金会：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的领导者

滨海湿地是中国最濒危、保护力度最弱的生态系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受各类开发活动影响，中国已经损失了 53% 的温带滨海湿地、73% 的红树林和 80% 的珊瑚礁。滨海湿地受到法律保护的比例为 24%，明显低于中国湿地的平均保护率（43.51%）。在浙江、江苏、天津、山东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市，滨海湿地成了经济开发的热点地区。短期而言，这给现存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长远来看，则对当地居民构成了严重威胁。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携手合作，组织数十名中国科学家和多位国际专家开展实地考察、进行科学分析并提供政策建议。为加强沿海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国家林业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携手合作，建立了一个由 11 个沿海省份的 35 个国家级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构成的保护网络，旨在加强保护工作的协调和配合。保尔森基金会还在中国最大的湿地鄱阳湖开展湿地保护示范项目，项目将示范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平衡社区发展的最佳实践方案，项目引入国际经验，通过政策评估，撬动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投资。在此投资策略下，鼓励民间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将能提升政府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的有效性。

保尔森基金会中国湿地保护项目得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该项目是联合基金⁹(UF)项目之一，通过东西方慈善论坛成功对接并实施的公益项目。



图-9：牛根生先生在夏威夷

SEE 基金会为中国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为国内最著名的环保基金会，自 2008 年成立起，持续在生物多

⁹ 联合基金由东西方慈善论坛发起，为慈善家捐赠合作平台。

样性保护和生态保护领域开展项目资助和机构资助，截至 2015 年，已累计投入资金 2000 余万元，保护工作覆盖了 8000 万亩草原、湿地和森林，支持的保护机构、团队达 200 家以上，构建了坚实的落地保护网络。2016 年，SEE 基金会对滨海湿地及内陆湿地生态保护进行科学分析，选定 146 个地块作为未来资助及工作优先区，其中包含滨海湿地保护空缺区 107 块，并在这些区域开展实地保护示范项目“任鸟飞”项目。

“任鸟飞”资助项目将广泛调动民间机构、企业、社会公众力量，覆盖填补保护空缺，形成与官方自然保护体系互补的民间保护网络，建立多种形式的保护区，推动政策完善，共同守护中国最濒危湿地鸟类的栖息地。项目计划在中期实现民间湿地保护行动网络覆盖 60%以上“行动优先区”，栖息地预警体系形成，预警响应机制开始运行。“行动优先区”2%的地块完成从保护空缺向民间保护地、国家级或省级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小区、社区保护地等形式的保护地过渡，保护成效相较之前应有明显提升。并通过资助项目推动全国性的民间鸟类监测数据库，形成学界的数据应用。推动保护立法和政策完善，形成与立法对口负责部门或主要承担者的合作关系。

项目为国内目前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保护资助项目，项目将由 SEE 基金会企业家捐赠、公众募集等形式募集资金，并将在联合基金（UF）的平台上进行资金募集。

3.2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引领减排及绿色能源革命

气候变化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上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由于人类过度使用化石能源、过度毁林及土壤生态系统破坏，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导致全球大气环境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世界气象组织（WMO）2015 年 11 月发布《温室气体公报》，2014 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次突破历史记录，其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397.7ppm（1ppm 为百万分之一），是工业革命前的 143%¹⁰，已经大大高于科学界认为的温室气体浓度安全值 350ppm。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加，目前已经比 1990 年的排放高出 50%。

¹⁰光明日报，2015 年 11 月，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15/c70731-27817115.html>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单位:G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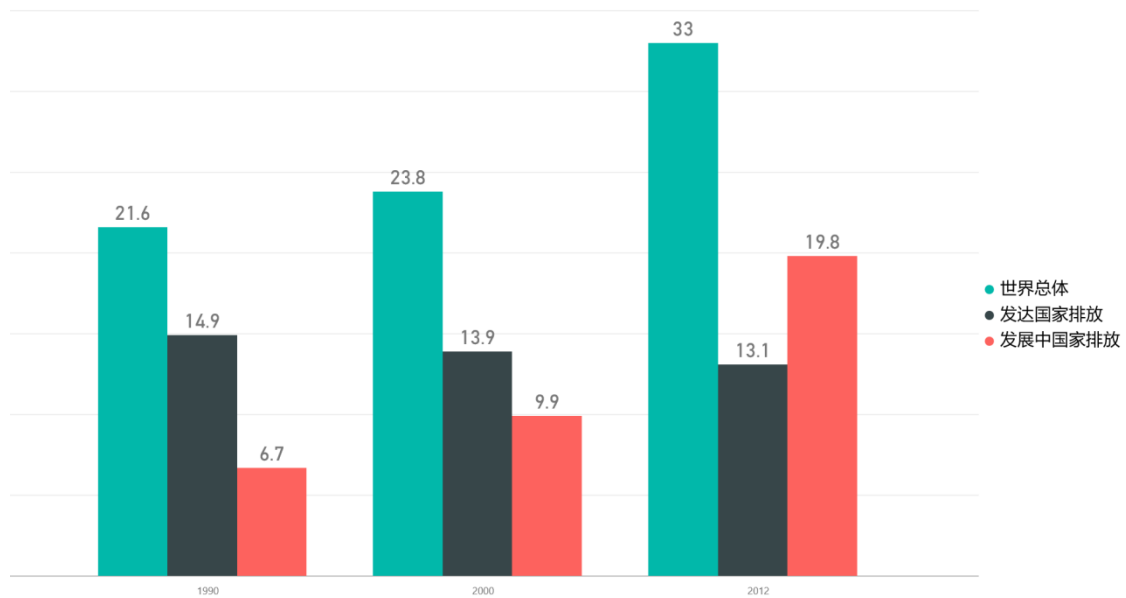


图-10: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数据显示，1990 年到 2000 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约 10%，2000 年到 2012 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38%，发展中国家的增量较大。但从人均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见图-5）。

气候变化领域伴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而逐渐成为环境可持续领域的资助热点，至 2013 年，全球主要资助者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资助超过 4 亿美元，约占环境资助领域的 13%。

在气候变化领域，民间的资助主要集中于倡导减排、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等方面。美国参与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资助的基金会包括大卫及露丝·派克德基金会（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巨变基金会(Sea Change Foundation)、威廉及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欧洲也有一些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的基金会，例如橡树基金会等，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进行了大量的项目投资。出于气候变化资助的专业性和全球性的属性，环境基金会的联合行动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联合的基金会，例如由麦克阿瑟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发起的能源基金会作为能源领域的联合资助组织，在派克德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等加入后，在全球进行了大量的气候和能源资助，其资助主要为智库型资助，进行能源、建筑、

电力和环境领域的研究及政策倡导。1999 年，能源基金会及发起基金会在中国启动了“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至 2014 年，累计为中国投入了 2 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支持，资助了近 2100 个项目，对中国的能效标识、可再生能源政策、大气环境治理等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节能减排，全世界慈善界在气候变化的适应上正在加大投入，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就在气候变化和农业开发上开始进行结合，进行了大规模的资助。除了提供资金，洛克菲勒基金会还用影响力投资的方式来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进程，洛克菲勒基金会宣布在其投资中退出了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

全球慈善家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影响力投资开始出现。2015 年，比尔·盖茨发起成立了“突破能源联盟”，联盟关注的核心技术领域包括发电和储存、运输、工业用途、农业和能源系统效率等，最终目标是“接近零排放”。联盟包括 27 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其中包括中国两位企业家——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联盟已经拥有 100 亿美元作为创始基金，联盟的投资条件是参与项目的国家须承诺将本国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预算增加一倍。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正在推动全球经济的转型，绿色经济开始萌芽，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等创新的方式正在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气候变化的行动者。慈善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角色十分关键，他们通过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撬动政府和社会的资源，来推动环保的主流化。

案例-5 老牛基金会：国际视野下的环境资助者

环境保护领域一直是老牛基金会重点关注和投入的领域之一，在过去的 10 年间，老牛基金会先后开展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中国湿地保护项目、老牛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清华大学老牛环境交流基金项目以及珠峰生态保护与社区能力建设项目等 16 个环保项目，累计公益支出超过 2.8 亿元，占基金会公益支出的 35%。

老牛基金会发起人牛根生先生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理事，将国际自然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引入中国，老牛基金会联合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内蒙古林业厅发起了“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为中国通过森林植被恢复进行减排和适应提供了项目经验。项目将历时数十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开展近 4 万亩的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从气候适应、植被恢复、水资源管理、绿色产业

四个方面进行生态修复的探索和示范。预计在未来 30 年计入期内，能吸收固定 22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能抵消 77 万辆机动车十年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直接为当地带来近 3 亿元的经济收益，并为当地解决近 114 万个工作日的临时就业机会，提供 18 个长期工作岗位。



图-11：老牛基金会资助内蒙古生态项目治理前后对比图

在气候变化领域，从节能减排到适应气候变化，再到资金机制和能力建设等诸多领域，中国国内基金会的参与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上已经做出诸多的行动和承诺，并已经开始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南南合作机制，在这些领域，中国的基金会都将会拥有巨大的空间，去撬动更多的投资，协力应对气候变化。

案例-6 燕宝慈善基金会：光伏和精准扶贫结合，实验绿色经济模式

燕宝慈善基金会，由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党彦宝发起。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集能源、医疗养老、商业、公益慈善多领域综合发展的大型集团企业。

宝丰集团将发展新型产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集团以发展新能源和滨河新区开发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太阳能资源富集优势，立足改善沿黄生态环境，投资 210 亿元规划建设 3000MWp 光伏发电项目、10 万亩枸杞扶贫项目及银川市近郊旅游项目。项目将通过枸杞种植改善生态，形成特色经济，并通过光伏发电来生产清洁能源，项目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 15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5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3.7 万吨。项目还将通过产业为 1.7 万户贫困人口创收，提供就业机会，实现精准扶贫，并实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绿色经济模式。

燕宝慈善基金会还积极参与当地扶贫开发，荣获 2015 年中国消除贫困奖。



图-12：党彦宝先生为大学生发放奖学金

3.3 在可持续人居领域推动建设低碳、智慧城市

在可持续人居领域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重点关注贫困人群的居住及饮用水的供给、基础的卫生设施等。在这些目标上，全球已经提前 5 年实现了 MDGs 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目标，2010 年全球使用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率已经从 76% 增加到 91%。从 1990 年以来，已经有超过 26 亿人获得了安全饮用水，近 19 亿人口使用上自来水，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58%）已经可以享受到这一服务，同期，直接使用地表水的人口从 3.46 亿下降到 1.59 亿。从 1990 年以来，有近 21 亿人口获得基础的卫生设施，但依然没有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从 1990 年至今，世界上能够使用基础的卫生设施的人口从 54% 增加到 68%。这意味着有 21 亿人获得了改善，使用露天厕所的人口比重下降了一半，从 24% 下降到 13%¹¹。

中国在可持续人居领域成效显著，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累计投资 2453 亿元，解决了 4.67 亿农村居民和 4056 万在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2012 年中国城镇使用改进厕所的人口比例达到 98%。中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 1993 年的 7.5% 提高到 2013 年的 74.1%。2008-2014 年，中央财政支持 1565.4 万贫困农户改造危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开工 4500 多万套，

¹¹联合国，2015，《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网址：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pdf/MDG%202015-C-Summary_Chinese.pdf

基本建成 2900 多万套，到 2014 年底，累计解决了 4000 多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¹²。

在实现可持续人居领域，政府的投入居多，全球慈善界的投入主要集中在进行创新示范技术的研发，以及结合气候变化、低碳城市、智慧城市新型可持续人居环境的营造领域。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起的“全球大挑战”，对饮用水技术的科技创新进行奖励和资助，寻找可以将污物净化成水的方法。2015 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 71 万美元兑一种新型技术研发进行资助，这种新型机器能够处理 10 万人的排泄物，每天能产生 8.6 万公升饮用水并提供 250 千瓦特电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还启动了“厕所创新挑战大赛”，开展“厕所重生计划”。2013 年 8 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捐赠 500 万美元，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厕所创新大赛-中国区（Reinvent the Toilet Challenge, RTTC-China）项目，面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等法人单位征集创新提案。慈善家布隆伯格结合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城市的气候变化适应，2014 年发起成立了全球市长盟约（Compact of Mayors），世界上超过 500 个城市的市长和市政府官员参与其中。该联盟成员城市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公开追踪进展，以及增强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中国达峰先锋城市联盟成立于 2015 年 9 月，目前共有 23 个成员。这些城市/省市均公布了早于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的率先达峰目标，为中国落实 2030 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提供支持。

中国可持续人居除了贫困人群的人居环境外，城市的大气、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正处在中国政府、公众的焦点公众议题。中国在 2013 年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年发布《水污染防治计划》，2016 年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宣布投入巨大资源用于大气治理、水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全球及中国公益界对该领域的关注除了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外，开始关注用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进行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中国公益界开始使用绿色供应链、智慧城市、绿色金融等一系列创新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可持续人居环境的营造。

¹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网址：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

案例-7 何巧女：中国环保产业和环保公益领军者

北京巧女基金会创始人何巧女，除了拥有巧女基金会发起人、著名慈善家的身份以外，由她创立的东方园林集团已经由一家园林生态企业转型为环保生态企业。环保是东方园林 2015 年重点发展的板块，业务包括环保水务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运营，固废垃圾的收集、转运、循环利用、处理及运营管理，以及土壤修复等服务。东方园林集团将自身立足于环保产业，参与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水环境治理、固废垃圾处理等行业。东方园林集团发起成立了“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联合体”，以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将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纳入至智慧城市的建设。东方园林集团正在用自身业务的发展向社会传递信息，环保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正在兴起，投资于绿色、投资于未来，也能够带来经济效益。

此外，巧女基金会也在环境公益上进行了大量投入。巧女基金会和 SEE 生态协会共同发起了 SEE 环保产业联盟公益基金，由 SEE 生态协会中的环境产业企业家组成环保产业联盟，对公益进行投资，用商业反哺公益，创造可持续的环境保护公益模式。巧女基金会还在中国和高校合作，资助海绵城市、绿色金融等创新机制的研究。



图-13：何巧女女士（左二）参加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仪式时与 Peggy Dulany 等合影

案例-8 卢志强：致力于低碳社区及可持续人居建设

中国泛海持续探索与环境和谐共处之道，在地产建筑施工、能源消耗、日常办公等方面积极挖掘自身节能降耗潜力，走与环境共生的可持续之路。坚持绿色节能理念，推广绿色节能技术，在规划设计、采购、实施、技术研发等阶段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建筑与环境共生。作为三大能耗行业之一，在建筑业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泛海一直走在推广绿色建筑的前沿，为社会提供节能、低碳、可持续的建筑产品。



图-14：泛海节能减排理念

在企业发展、提供就业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清洁的能源是关键。中国泛海的能源业务始终将低污染、高效率的目标纳入规划，致力于发展与推行绿色能源。泛海集团在其国际化的项目拓展中，也坚持示范绿色和低碳社区，成为建筑行业的绿色引领者。

由泛海集团发起成立的泛海公益基金会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教育上进行了投资，2012年4月，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向北京绿色未来环境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用于开展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资助环境专业在校特困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环境教育项目。

泛海公益基金会还是中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之一，长期在教育 and 扶贫事业领域进行公益捐赠。

3.4 用创新推动贫困人口获得公平发展机会

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是消除极端贫困，过去的二十年间极端贫困率显著下降。1990年发展中国家近一半的人口依靠低于每天1.25美元生活，而到2015年这一

比例下降至 14%。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下降超过一半，从 1990 年的 19 亿下降至 2015 年的 8.36 亿，其中大多数进展是在 2000 年后取得的（见图-6）。全球在消除极端贫困和消除饥饿上的成绩取得主要是各国政府及发展援助在进行经济改革，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以及城市化进程给贫困人口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让这些人群能够获得发展机遇，并消除贫困。

全球贫困人口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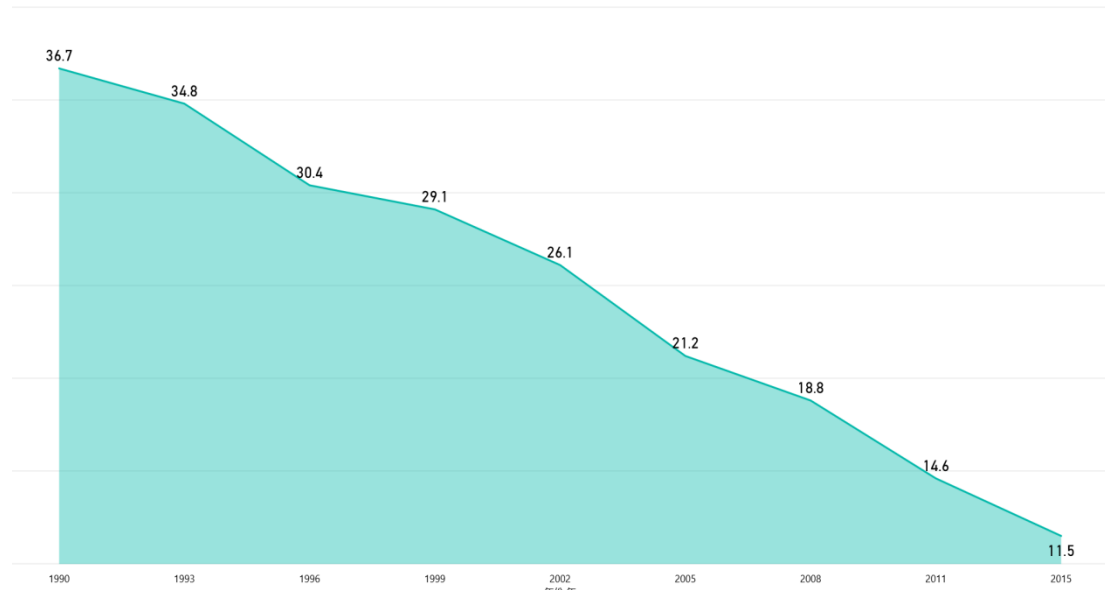


图-15：全球贫困人口比率

中国贫困人口从 1990 年的 6.89 亿下降到 2011 年的 2.5 亿，减少了 4.39 亿，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二五”期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0 年的 1.66 亿人，减少到 2015 年底的 6000 万左右¹³。中国的开发式扶贫取得了极大成效，为全球千年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全球慈善界在消除贫困上的努力主要用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通过农业种植技术、农村信息技术、农村金融服务技术等研发，用技术服务贫困人口，推动贫困人口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或者通过研究，推动体制创新，来服务贫困人口。在消除贫困领域，除了发展援助之外，慈善公益界的创新带来了重要的推动力，普惠金融、普惠科技等发展让贫困人群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了“授之以渔”。全世界最著名的案例包括了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通过小

¹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网址：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

额信贷的方式让孟加拉国的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支持，以具备摆脱贫困的能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引领的新公益，也推动用科技和技术创新服务贫困人口，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并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2015 年盖茨夫妇在年信中宣布计划投资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开放的支付系统，与现有的支付系统进行互联。

成立仅 16 年的比尔及梅

案例-9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慈善的催化剂

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参与
全球消除极端贫困，并联合政

府和各国慈善家一道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工作。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考虑消除贫困时通过综合分析，致力于几大核心工作领域，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入最大力量的全球健康项目，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这些重大传染病也是贫困人群面临的最大挑战。



图-16：比尔·盖茨夫妇陪同彭丽媛参观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帮助农民打破饥饿和贫困恶性循环。投入资金用于基金会支持与农业发展相关的研究、数据收集以及政策分析，使商业领域能够通过研究开发新产品或者开放有益于农民的新市场帮助农业发展。此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还关注服务穷人的金融服务，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帮助非洲的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服务。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认识到尽管其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每年的赠款总额约为 40 亿美金，但是要实现目标，依然是杯水车薪。要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取得规模效应，只靠一己之力，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必须催化激励伙伴，共同努力、其中包括政府、企业、NGO，充分运用各自的专长和资源，投入到应对全球挑战的工作中。

当中国中央政府发起五年内实现全国脱贫的攻坚战时，长期对扶贫提供资助的王健林和万达集团已经探索并开创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模式。

案例-10 万达集团：产业开发促精准扶贫

对于如何解决贫穷问题，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但从效率上来看，企业的角色更值得期待。王健林和万达集团一直在探索更有效的扶贫模式，以此履行更大的社会责任。2014年，王健林和团队来到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丹寨县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考察，最终确定“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创新思路。在经历了初步的模式设计后，经过一年多持续的调研，2015年2月27日，万达正式发布“万达丹寨扶贫项目”方案，总投入14亿元，包括出资3亿元捐建一所丹寨职业技术学院、出资6亿元捐建一座旅游小镇、出资5亿元成立一支丹寨扶贫专项基金。

万达集团的扶贫举措，改变了过去单纯的捐赠，改为综合性扶贫，并推动产业扶贫和整县扶贫的策略。身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王健林还担任扶贫工作委员会主任，长期的扶贫让他体会到扶贫的复杂性。王健林也多次表示他个人崇拜作为慈善家的比尔·盖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的策略是否可以被万达所借鉴，甚至进行合作、未来中外慈善家在扶贫资助策略上的交流，还拥有较大的空间。



图-17：王健林参加中国慈善论坛

二、慈善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解决方案和资源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历史的转折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政府在政策及公共资金上的投入。企业和慈善界也将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将提供可持续发展关键的解决方案和资源，使世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慈善界在过去 20 年参与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而创新的手法和行动也为政府提供示范，并在政府和企业无意涉足的领域进行投入，有助于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行动都层出不穷，基于市场、利用技术创新来实现变革、是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中国的慈善公益界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创新尤为引人注目。

1. 绿色供应链：用市场化的方式保护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同时，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较低，延续了“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思维，环境成本无法体现在经济成本之中，环境破坏严重。1998 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开始在生态治理上进行投入，进行了林业六大工程，保护生态，在生态保护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大量生产带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对中国可持续的人居环境造成了极大威胁。

公众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给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环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于 2015 年修改了《环境保护法》，并先后启动了大气、水和土壤治理项目，计划投入近十万亿用于中国的环境治理工程。

只有将环境的成本融入到产品成本，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承担环境责任，人人参与，用绿色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让环境保护更有效。这成为了环境保护界的共识，用市场化的方式，通过绿化供应链，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的采购与消费力量，产生市场机制的杠杆效应，推动供应链企业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能效，提高整个供应链体系环境治理效率，促进整个产业链条的绿色升级。这种创新的环境管理手段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激励和倡导型的措施，鼓励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进行绿色改革。

在美国和欧洲，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正在提升。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研，已经有 74%的消费者开始关注产品的环境责任¹⁴。另外政府的环境执法严厉，企业重视自身的环境责任，特别是欧美上市企业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披露义务，很多企业都主动进行环境责任披露，并在环境责任和目标上进行公开承诺，在供应链上，对下游供应商进行管理。很多国际品牌都建立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及环境承诺及标准（见表-1）。很多国际民间组织也和企业一道推动企业环境及可持续责任标准体系的建立，并监督企业执行这些标准，并披露绩效，接受公众监督。保护国际（CI）建立了环境领导力培训中心（CELB）推动沃尔玛、星巴克等企业形成自身可持续发展标准。

曾经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主要生产产品的销售不在中国，消费者的力量并不能对生产商产生威慑力。在民间公益机构的推动下，国际品牌开始在中国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开始对供应商进行环境绩效管理，并帮助他们提升环境绩效。绿色供应链正在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接纳。2011 亚太经合组织（APEC）发布了领导人宣言，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签署了宣言。宣言规定，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 2015 年底之前要将所有绿色商品的关税削减到 5%以下。2013 年后，中国陆续在天津和广东东莞试点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

表-1：全球知名企业的环境可持续目标及承诺

企业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承诺
沃尔玛	2010 年宣布，其目标为实现所有门店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零废弃物的目标，以及销售环境和资源友好型的产品
苹果	苹果公司宣布 100%可再生能源的愿景和计划，包括使用太阳能、沼气、燃料电池、地热及小型水电站等。2015 年，已经实现 93%的能源来源于可再生能源。 回收材料，并使用可持续林业包装材料，减少产品的环境足迹。 2015 年，启动了 Full Material Disclosure 项目，披露每一个产品组件中每一种物料的化学成分。这个项目也使得能更有效地减少和消除有毒害物质。
联合利华	2013 年，联合利华宣布，承诺将在 2020 年前实现所有棕榈油采购自可追溯且获得可持续认证的源头。

¹⁴BCG, 2009, Capturing the green advantage for consumer companies, 网址：
www.bcg.com/documents/file15407.pdf

	2015 年，联合利华启动“可持续生活计划”，宣布到 2020 年，帮助超过 10 亿人改善健康卫生状况；将产品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一半；实现全部农业原料的可持续性；改善产业链上数百万人的生计。
星巴克	星巴克和保护国际（CI）发起 C.A.F.E（“咖啡和种植者公平条例”），成为了咖啡行业的第一套可持续发展标准。星巴克承诺其采购 100% 遵守该标准
惠普	2004 年，惠普参与到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ICC）的创建并成为会员。供应商通常要跟惠普签署一个关于社会和环境保护责任（SER）的协议，其中包括一般环境规范（GSE）。2008 年，惠普宣布了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成为首个披露供应链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IT 企业。

在中国公益界的推动下，中国企业界对绿色供应链的响应十分积极。SEE 基金会及会员企业参与绿色契约项目，推动会员企业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承诺，在第一批房地产企业的绿色契约承诺中，倡议及承诺首先在采购环节，要求参与企业按照共同的标准进行采购，这一承诺共涉及 5000 多家房地产开发商、规划设计企业及金融机构，开发项目分布在全国 100 多个主要城市，上万亿产值，将会产生重大的环境影响。阿里巴巴集团也在 2016 年宣布进行绿色经济体的计划，在其电商平台中推广绿色消费，这将有可能对其电商平台上近 3 万亿元的贸易产生影响，让绿色消费变成现实。SEE 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及国际基金会包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自然资源委员会等都对推动中国企业进行绿色承诺进行了资助和推动。但国内公益机构中，仅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发起的绿色选择联盟参与了推动，该联盟对这些企业的监督和推动还是不足。而且，中国民间组织还缺乏在绿色供应链标准制定上的参与。未来急需民间机构在绿色供应链的标准化开发及推广上发挥作用。

案例-11 惠普：星球伙伴计划

全球电子产品领导品牌惠普（HP）制定了全面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政策，对业务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以及开展全球性的环境项目和服务来实践自己的

诺言。2008 年 2 月，惠普公司正式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拯救者计划”。惠普致力于积极解决全球性环境难题，并一如既往地 与股东和各种团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创新的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同时全力平衡企业利益与环境要求的关系。



图-18: 惠普的“可持续发展”环保理念

惠普发起的“星球伙伴计划”包括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容，惠普明确了对产品和材料供应商的要求，供应商必须符合惠普关于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劳动以及人权问题的要求。惠普正与供应商合作，共同打造能最大限度降低设计、生产和运营对社会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系统、流程和结构。

电子垃圾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环境问题。在环保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惠普公司考虑其产品在使用寿命结束后对环境的影响。惠普的计划是对出售的产品提供全球性回收服务。惠普已经与全球领先的回收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案例-12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供应链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成立于 2006 年 6 月。IPE 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在公众知晓环境信息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履行自身的环境责任。

IPE 成立后，恰逢中国开始实施信息公开条例，零星及分散公布的环境信息及污染处罚信息通过 IPE 的整理，最终形成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水污染地图，一张是大气污染地图。地图和污染处罚数据库作为一个公开的污染信息平台，可以提供给企业和消费者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价，便于公众参与到监督企业污染的过程中来，目前数据库已经有超过 25 万条企业违规排放处理记录，这些记录都将可以成为企业环境信用，应用于上游品牌的供应链管理及金融风险控制依据。

IPE 还和 41 家 NGO 共同形成了绿色选择联盟，督促企业达标排放，NGO 在绿色选择联盟中的合作卓有成效，很多企业也开始承诺利用这些数据，例如溢达，GE，Nike，西门子，还有国内的联想和李宁等。

2014 年，中国环保部要求所有国家重点控制污染企业实时公开其排放数据，1.2 万家企业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也为 IPE 等提供了更大的数据源，可以更加完整的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评估，并将为绿色供应链的开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图-19: IPE 开发的污染地图数据库

在巨大的数据量的支撑下，IPE 等公益机构将有可能深入地进行绿色供应链的标准化推动。2016 年 6 月，SEE 基金会的房地产会员企业和 IPE 等民间机构联合发起了绿色契约承诺。SEE 基金会的 40 余家房地产企业发起了绿色采购的承诺，在其供应链中充分考虑环保标准，该倡议和承诺将有可能影响近万亿的采购。

2. 绿色金融：推动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环保机制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时考虑环境与社会风险，遏制资本流向污染产业，并积极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绿色金融也涵盖金融机构自身的环境管理，如建筑节能、绿色办公等，但相对来说，金融业务所造成的间接环境影响要比金融机构自身的直接环境影响要大得多，因而是绿色金融讨论的焦点。

2003年，由花旗银行等发起的“赤道原则”是绿色金融的开端，全球的金融机构开始考虑用有利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自愿性准则来进行风险管理。2012年，英国为了解决公共气候融资的问题，由政府出资建立了“英国绿色投资银行”（GIB）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于存在市场失效的绿色环保项目领域。GIB目前由英国政府全资控股，政府初期划拨38亿英镑供其在2016年3月前投资绿色项目。作为绿色投资市场的“催化剂”和补充者，GIB的宗旨是引进和鼓励更多的私有资本投入到绿色经济领域，从而促进英国的绿色经济转型。

而2014年后，中国在绿色金融上的步伐加快。中国绿色金融的开端是绿色信贷政策。早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和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推出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金融机构关注环境风险，并倡导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共享企业环境违规信息。2012年，银监会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编制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向银行金融机构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包括组织架构、风险控制的措施、信息披露等。2014年底，在银监会的支持下，中国银行业协会发起成立绿色信贷专业委员会，29家银行加入。2014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召集的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简称“绿金委”）成立，提出了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框架的14条建议。绿金委的成立，加速了绿色金融成为中国主流的金融政策，绿色金融被写入中央生态文明改革方案，绿色金融还被推荐成为2016年“G20”的主要议题。2015年，在绿金委的协调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截止目前，中国境内银行机构发布绿色债券已经突破750亿元人民币，接近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一半。

绿色金融作为市场化的环保机制在全球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益机构

的推动和力量。全球主要的环保机构，包括世界资源所、世界自然基金会、能源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和布隆伯格基金会都参与推动绿色金融在各地的落地。在中国，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绿金委等都是最主要的推动者，而这其中，由巧女基金会支持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发挥了重要智库作用。

案例-13 保尔森基金会： 助推中国绿色金融

保尔森基金会成立于 2011 年，创始人是美国第 74

任财长及高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保尔森

基金会致力于通过项目、倡导和研究活动，推动中美

两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保尔森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切合实际而又经济有效的方式，保护生态系统、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空气污染、建设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并改善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同时支持经济增长和减少对地球持久存在下去的威胁。

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中，保尔森基金会通过研究，和彭博慈善基金会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表研究报告：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新建绿色建筑与既有建筑改造需耗资 1.65 万亿元人民币（约 2540 亿美元）。中国政府能提供的资金不到 10%，中国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节能改造及绿色产业发展。

2015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倡导成立中美建筑节能基金。该基金旨在利用美国的技术，推动节能建筑的发展，鼓励中美跨境创新，并共同创造绿色就业机会。首批预计募集的资金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30.5 亿美元），首批资金在河北省和江苏省 5 个城市实施。

保尔森基金会还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将于 9 月召开的杭州 G20 领导人峰会之前，针对全球绿色金融机制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将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和英国央行联合主持的 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供小组参考及撰写综合报告，并提交 G20 峰会。



图-20：保尔森参加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首批项目签约仪式

案例-14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中国绿色金融的高端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是中国人民大学建立的智库，旨在推进生态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传播。中心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管理，主要围绕生态金融产业等课题展开研究，探索如何促进金融体系与绿色、可持续经济的融合，探讨如何制定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金融政策和法规。

该中心作为智库，将研究从顶层设计上解决生态资金的来源，凭借金融创新让绿色产业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引导更多资金流入绿色事业，实现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图-21：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理事马骏博士主持发布了中国首份生态金融报告，该报告分别阐述了境内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必要性，介绍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防范和转移环境污染风险方面的功

能、对贷款人的环境责任以及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提供了政策建议。报告对中国绿色金融的政策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的成立得到了东方园林集团董事长何巧女的支持，并由巧女基金会提供资助，支持中心的智库研究和运营。

3.创新科技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甚至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可以看到科技发展及技术进步对消除贫困带来的积极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很多贫困群体摆脱了信息壁垒，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和突破都是实现该领域目标的重要前提。而过去的二十年，也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人类在基础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都可能帮助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中，在未来二十年，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有可能会继续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互联网革命及科技革命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世界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信息的壁垒，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减贫方面可以成为很有效的工具，互联网解决了由于信息壁垒导致的不公平，过去很多社会及市场的边缘人群将有可能得到服务。例如，过去由于交通和信息闭塞导致无法在市场中销售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大批农民在手机和互联网信息的帮助下销售产品，增加收入。

互联网行业正在高速发展，以 5G、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为基础的互联网时代正在到来。互联网行业必然深刻的影响到可持续发展领域：

第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更加便捷的流动，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非正式就业机会，大量贫困人群可能依靠互联网获得新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例如电商行业的发展，为中国超过 1200 万中小企业创造连接消费者的平台，促进消费的发展和升级。过去很多拥有资源，但无法转化成为经济价值的贫困人口将受益，并摆脱贫困。

第二，互联网将改变社会治理结构，特别是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可持续发展的多元治理真正成为可能。例如，环境监测，将改变目前单一监

测的格局，而改为基于云计算的分布式的监测体系，并且监测数据能够被社会使用，使政府执法变得更加有效率，而这些数据将能够应用于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机制，例如绿色金融和绿色供应链等。

第三，互联网将改变中国的能源及资源利用方式，例如基于云计算的智慧城市，智慧能源等将大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

第四，互联网带来的共享经济浪潮，将让闲置资源在社会中流动，减少资源的浪费和闲置，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例如，在交通、酒店等行业正兴起的共享浪潮，将会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

第五，互联网还将创造新的行业计划，例如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传统环保行业和互联网的结合，缔造了环保的 O2O 热潮。垃圾回收、电子产品回收、废旧衣物再利用等互联网企业正在快速发展。

最后，互联网还为公益行业提供基于公众的募捐平台，让公众支持公益成为可能。从 2012 年开始，新浪微公益平台，腾讯公益，淘宝公益及蚂蚁金服公益募捐平台为公益机构提供了超过 20 亿元的公益捐赠。

在全世界，可持续发展都与科技及技术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在公共医疗领域，科技和技术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全球慈善界在科技发展上发挥着领军的作用。无论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入巨资在药物开发、医学研究和新能源技术开发及研究上，还是摩尔基金会投入巨资建立生态保护科学研究中心，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提供支持，科学技术和互联网发展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最大的推动力之一。

案例-15 摩尔夫妇基金会: 科学创 新驱动自然保护

摩尔夫妇基金会是在 2000 年 11 月由戈登·摩尔和贝蒂·摩尔夫妇创建而成。目前，摩尔夫妇都是该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虽然基金会成立时间不长，但却影响广泛。

摩尔夫妇基金会的工作宗旨是致力改善下一代的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摩尔夫妇在基金会成立之初便提出：为下一代创建美好将来。这句话便成为了基金会一直以来的发展目标及工作宗旨。

环境保护、科学、高等教育和旧金山海湾计划是该基金会致力开发的四个主题项目。基金会承诺，作为一个具备社会责任的机构，他们会将基金会所得的每一分每一毫善款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并与不同的机关组织共同合作，致力把基金会打造成一个消息灵通、备受业界尊崇、专业而灵活高效的慈善组织。

基金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关注。全球生物的保护工作是基金的重点投资项目之一，目前保护工作范围有两个：第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亚马孙河流域，因为科学家相信，地球上超过 5 成的动植物都是生长在热带雨林区；第二是关于野生鲑鱼的生态系统，保护地区主要是北太平洋一带，如美国阿拉斯加，前苏联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地。为了增加大众对环境保护和科学发展的认识，基金会还开设了一些自学中心、博物馆等，为孩子们提供教育资讯，培养他们爱护环境的意识和对科学的兴趣。

摩尔基金会向“保护国际”基金会捐赠了 2.61 亿美元，这是该基金会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一笔私人捐赠，保护国际成立了全球应用保护科学研究中心，资助科学家在全球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指导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规范和成效评估。



图-22：摩尔夫妇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是人们熟知的三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这三家互联网公司，各自在自己的业务体系内建立了完整的生态，并成为可以和全球著名互联网企业所媲美和对标的中国企业。而三家互联网企业所推动的中国互联

案例-16 BAT：引领中国的互联网公益

网公益的发展，也正在让中国的公益备受世界瞩目，互联网公益让人人参与公益变成可能，而三家企业所建立的企业基金会也是中国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

腾讯集团是中国社交领域的绝对领导者，微信和 QQ 两个应用拥有超过 7 亿以上的用户，腾讯打造的公益捐赠平台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公益捐赠平台。2015 年，腾讯通过微信，为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募集超过 5.7 亿捐赠，而 2015 年 9 月 9 日的公益日，3 天就发动了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公众捐赠。众多环境保护项目也通过腾讯公益的募款平台进行筹资。

阿里巴巴集团以及蚂蚁金服集团，作为中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领导者，除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捐赠平台之一以外，还通过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推动将绿色植入到阿里巴巴及蚂蚁金服集团的业务场景中，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菜鸟网络 2016 年宣布了实施绿色物流战略；淘宝和天猫等电商平台 2016 年发布报告，平台上绿色消费的趋势正在增加；蚂蚁金服集团也在 2016 年 5 月宣布，绿色金融作为其四大核心战略之一；阿里巴巴集团还承诺了将集团收入的千分之三用于环保公益。

百度集团推广互联网+环保的应用，通过百度直达号，应用大数据来进行电子产品的回收，百度公益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发起了互联网+环保大数据实验室。



图-23：百度基金会电子垃圾回收项目

4. 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为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社会企业兴起于欧洲，1978 年，英国就已经提出“社会企业”的名词，全球最大的社会企业家网络“阿育王”的创始人 Bill Drayton 提出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2006 年，旨在消除贫困的社会企业“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社会企业被世界知晓。

社会影响力投资起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200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融合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和财务价值协同的投资。2010 年，摩根士丹利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发布研究报告，提出影响力投资被界定为资产类别，瑞银集团提出影响力的标准、类别，让影响力投资逐渐形成气候。

据估计，2014 年，英国的影响力投资达 10 亿英镑左右。2014 年，英国的社会投资工作小组在其报告《影响力投资：市场的隐形核心》中做出了更为大胆的预测：未来英国的影响力投资来源将更加国际化，投资规模将达到 1 万亿¹⁵。

洛克菲勒家族和基金会在影响力投资上引领全球。2014 年，为了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洛克菲勒家族及基金会宣布出售在化石燃料上的投资，转而投入到清洁能源行业，并且开始逐步全面告别在化石燃料开发上的投资。

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在英国文化协会推动下，参与培训了一批社会企业，并由南都基金会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联盟，涵盖了中国 16 家非公募基金会作为其联盟会员。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也开始成立了一些影响力投资基金，例如，青云创投主要关注的就是环保产业的投资，由世界资源所（WRI）发起的道资本集团也专注在环保领域的投资。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预期规模很大，但依然在发展的初期，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研究、影响力评估等还欠缺，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需要更加跨界的合作和商业模式的总结。

¹⁵21 世纪经济报道，2015，影响力投资的理想与现实，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1020/020923517689.shtml>

案例-17 B-LAB: 社会企业认证体系缔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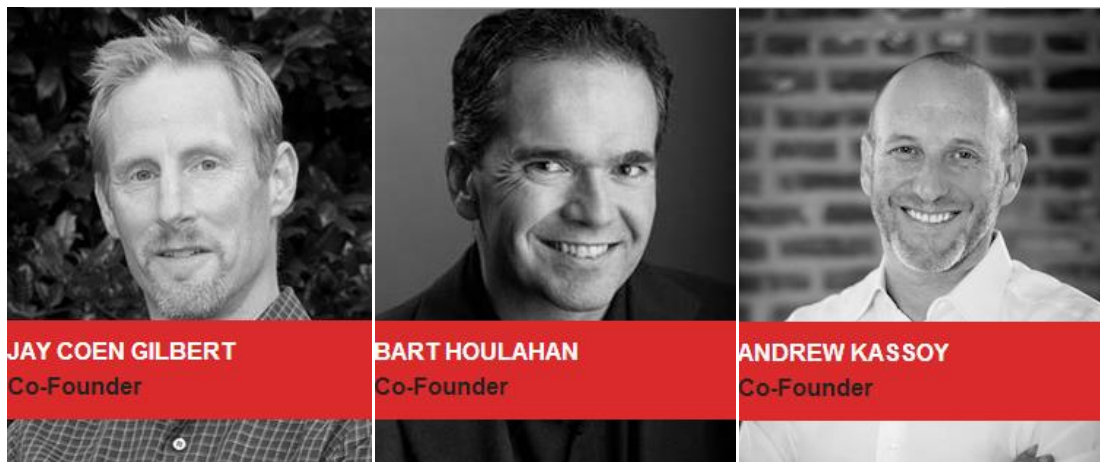


图-24: B-Lab 联合创始人 Jay Coen Gilbert, Bart Houlahan, and Andrew Kassoy

B-Lab 是 2006 年在美国成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NGO），致力于推动全球企业用商业的力量改善社会（business as a force for good）。B-Lab 的主要工作包括：通过进行认证工作和活动宣传，建立全球性的 B 型企业社群（a global community of Certified B Corporations）；推动当局立法，使同时考虑私人与公共利益的企业形态获得法律地位，以保护公益投资者的利益，让公益创业者面对商业压力能够坚守自己的使命；建立影响力评估和数据分析工具，帮助企业衡量自己的影响力，提高更多企业的公共利益意识和影响力管理能力；通过公关和营销活动，让更多人知道 B 型企业的故事，加入这场运动。

B 型企业的认证逐渐在美国形成规模，通过认证，将有助于这些企业融资以及营销，甚至许多 B 型企业成功登陆纳斯达克等资本市场。

目前，全球 50 个国家共有 1850 家获得认证的 B 型企业¹⁶，其推动立法的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形态已在美国 31 个州获得法律地位。

案例-18 沈国军：社会企业参与扶贫

沈国军，银泰集团创始人、银泰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沈国军坚持用商业的理念做公益，近几年，在环境保护和精准扶贫上，开始进行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尝试。

2015 年 11 月，银泰集团和河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河北银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投资逾 150 亿，对河北境内太行山区约 500 万亩荒山进行整治、改造，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帮扶

¹⁶ 最新数据见其官网：<http://www.bcorporation.net>

150 万人口脱贫，建立现代农业园区，打造一家平台式的社会企业。

除了在扶贫上引入社会企业的概念、用商业的手法推动扶贫，沈国军还和其企业家伙伴们，一道为自然进行投资。2011 年发起成立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由民间资本租赁自然保护地，建设由民间管理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2015 年春，沈国军亲自操盘，与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朋友共同成立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将关注国内外生态保护事业，并将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全球从事自然保护的机构，让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图-25：沈国军（左六）发起成立桃花源基金会

三、全球慈善界可持续发展行动展望

1. 善经济：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共享社会价值

人类已经进入善经济时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教授 2013 年预测，在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时，全球将进入善经济时代。在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企业没有社会价值会举步维艰。大量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组织将要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基本实现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将更加多元和综合，民间社会和企业的参与将变得格外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特别是环境保护等离不开市场机制和商业手段，而企业和私营部门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投入的资源靠政府和国际援

助是无法满足的，只有私营部门的参与，企业和民间将社会价值融入自身商业模式，让自身商业模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全球企业在经历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时代后，也即将进入企业共享社会价值（CSV）的时代。企业共享社会价值时代的突出特征是企业用公益的心态和思路做商业，在商业中更多考虑自身的环境及社会影响，并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寻找到商机。

随着善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及经营者能够意识到自身商业和社会价值之间的连接，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准备，理解企业和公益的人才的培养将至关重要。未来慈善界和企业的跨界合作，引导企业挖掘自身价值，服务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公益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急需商业环境领导力的跨界合作平台。

2. 跨界联合和联合基金：慈善界的合作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再单纯是政府的职责，而且从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分析看，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不足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公益慈善界的投入以及企业的投入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上占据重要的作用，因此跨界联合及合作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即使是慈善家之间，跨界合作也将越来越重要。很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是交叉融合的，慈善家之间的合作将能够在不同的主题下形成合力。

比起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将更依赖于技术、制度与社会创新，慈善界在创新上有先天优势，而慈善家之间的合作、甚至联合资助，将能够分担创新成本。通过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回顾，我们发现了大量成功的案例，都有联合资助的影子，例如能源基金会汇集了5家以上全球最大的基金会的联合资助力量。中国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案例，也汇集了中外多家基金会联合资助的力量。

由中美慈善家论坛发起的联合基金（UF）就是以跨界合作、创新的慈善联合来推动公益资源融合的平台。联合基金将会有国际的合作，有不同领域背景的

慈善家之间的合作，以有影响力的联合公益项目来推动提升公益实践和创新的水准。如同联合国是国际间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功能和作用，慈善界的联合也需要一定的平台，共享策略、共同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和评估，实现撬动和整合政府及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的投入。

在中美慈善家发起的联合基金的平台上，已经有老牛基金会和保尔森基金会、SEE 基金会等达成项目合作。虽然这一平台目前规模尚小，但随着中外慈善界合作深入，联合基金的规模将扩大，并有可能通过合作来整合及协调基金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行动。

案例-19 能源基金会：联合带来的力量

能源基金会于 1991 年由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皮氏慈善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和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共同创建。乔伊斯·默兹吉尔墨基金会（The Joyce Mertz-Gilmore Foundation）和麦克耐特基金会（The McKnight Foundation）分别在 1997 年和 1998 年作为基金合伙人加入。能源基金会在美国的计划主要集中于五个领域：建筑节能、电力、可再生能源、先进技术车辆和综合问题。基金会在美国本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州的层面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对各州政府在采取清洁能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前身是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China Sustainable Energy Program），最初由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和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资助成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能源基金会中国不断发展成长，资助方也持续增加，2014 年机构在中国的赠款金额累计已超过 2 亿美元。

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宗旨是推动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帮助中国过渡到可持续能源的未来。通过资助中国的相关机构开展政策研究、加强标准制定，推动能力建设和传播最佳实践，助力中国应对能源挑战。能源基金会中国的项目资助领域包括建筑节能、电力、环境管理、工业节能、低碳发展、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城市和交通八个方面。

截止 2014 年年底，能源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项目达到 2100 个，项目单位超过 540 家，其中包括国内外一流的政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地方节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



图-26：能源基金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2014 年，在能源基金会的发起下，SEE 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 5 家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卫蓝基金”，该基金由 SEE 基金会运作，资助中国民间环保机构参与中国大气治理的民间行动。在该基金的基础上，SEE 基金会整合起环境资助，发起了“卫蓝侠”资助计划，每年向国内大气及水环境领域的民间参与行动提供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3. 领导力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跨界合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企业和慈善界的合力，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力建设，是确保三方有效合作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是简单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教育，而是包含了对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与监测，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开发和公众参与等诸多内容和课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人力资源保证及智力资源保证。

在欧美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已经开始有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体系。在剑桥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世界名校，都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学院，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枢纽。其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为著名慈善家 Julie Ann Wrigley 参与资助和建立。在中国，截止目前，只有联合国环境署和同济大学合作成立了一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现有的能力建设机构还都分散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或是商学院教学的课程之中。

随着中国慈善公益界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深度参与，对人才的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特别是跨界可持续发展人才的需求将更加迫切，而且在可持续发展领导力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女性的参与，女性的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的建设中，需要优先考虑女性领导力的建设。

案例-20 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跨界研究及合作

2006 年，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建立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是在美国慈善家 Julie Ann Wrigley 的帮助下建立的美国第一所培养可持续发展领域人才的学院，学院汇聚了包括生物、地理科学、经济、工程的科学家。该研究所通过研究、教育以及服务项目解决全世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学院提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及可持续管理高级人才的培养。学院已经为美国培养了超过 947 名校友，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可持续发展领导力培养机构，学院也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典范。

2014 年，Julie Ann Wrigley 宣布向学院捐赠 2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学院的发展，学院也改名为 Julie Ann Wrigley 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Julie Ann Wrigley 女士还是 Julie Ann Wrigley 基金会的总裁，并担任了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理事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国家委员会顾问。



图-27：亚利桑那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学院毕业典礼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起成立了全球可持续联盟，可持续发展联盟（The 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 TSC）是一个会员遍布全球的组织，会员通过协作为推动创新进而改进消费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科学基础。开发透明的方法、工具和战略，促进新一代产品和供应网络的形成，解决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需求。TSC 提倡可靠的、可持续和透明的流程和系统。TSC 拥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90 多家会员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总数超过 850 万，总营业额超过 2.4 万亿美元。

可持续发展需要跨界联合。由多位著名慈善家联合发起的东西方慈善论坛，正在成为全球慈善界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交流平台。今年夏天，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来自五大洲的慈善家将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联合发起更为务实的合作，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共建共享让包括人类在内的全球生物可持续共享的蔚蓝星球！

参考文献:

- 1.环境保护部（2014）：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报告
- 2.孟志强等（2012）：《2011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
- 3.联合国（2015）：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2015
- 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释放中国的慈善潜力
- 5.WWF（2014）：地球生命力报告
- 6.WWF（2015）：地球生命力报告（中国）
- 7.张强（2015）：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与发展路径，中国行政管理
- 8.张丽霞（2009）：中西方慈善捐赠的比较研究，经济研究导刊
- 9.庄梅兰（2006）：中外企业捐赠模式比较研究，鞍山科技大学学报
- 10.周秋光（2014）：困境与出路：近十年民间慈善捐赠分析，中国社会福利
-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
- 12.赵宝爱（2009）：论中国国际慈善组织的发展和活动，济南大学学报
- 13.杨团（2014）：《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4.杨团（2012）：《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5.杨团（2016）：《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6.BCG (2009): Capturing the Green Advantage for Consumer Companies
- 17.Foundation Center (2014): Analyzing trends in environmental grant making-summary of tracking The field
- 18.Foundation Center (2015): Engaging Philanthropy i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Lessons Learned and Ways Forward
- 19.UNEP (2014):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4: A mid-term assessment of progress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 20.UN (2015):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附录 1：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历程

全世界对环境保护的共同行动可以追溯到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首脑会议）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代替了工业革命以来那种“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1992 年的里约峰会也开启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进程，1992 年，在里约，通过了《21 世纪议程》，并在里约及之后形成了环境保护领域的 3 个重要公约，包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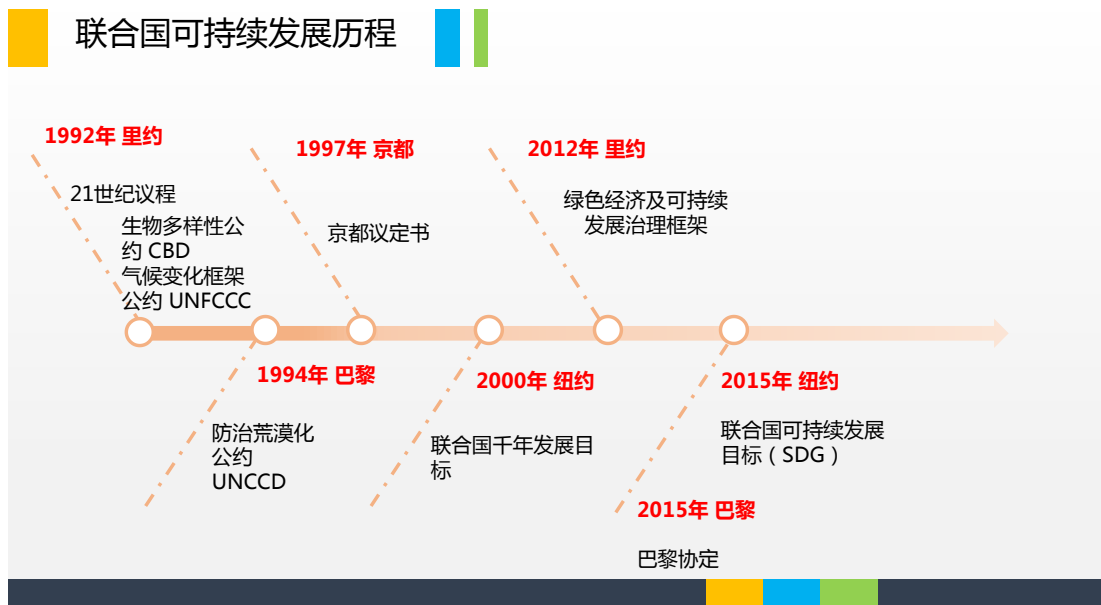


图-28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历程

2000 年 9 月 5 日开幕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该宣言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 2015 年之前降低一半（以 1990 年的水平为标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 MDGs）。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即将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将在峰会上正式通过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有 7 个指标与环境可持续性直接相关。

附录 2：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一项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 2015 年之前降低一半（以 1990 年的水平为标准）的行动计划，2000 年 9 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 189 个国家签署。中国提交的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情况报告显示，中国实现了大部分目标，仅“生物多样性保护”一项未能很好实现。

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

具体目标	实现情况
目标 1：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	
目标 1A：1990 年到 2015 年，将日收入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	已经实现
目标 1B：让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	基本实现 ^①
目标 1C：1990 年到 2015 年，将饥饿人口的比例减半	已经实现
目标 2：普及初等教育	
目标 2A：2015 年前确保所有儿童，无论男女，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	已经实现
目标 3：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	
目标 3A：争取到 2005 年在中、小学教育中消除两性差距，最迟于 2015 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	已经实现
目标 4：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 4A：从 1990 年到 2015 年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已经实现
目标 5：改善孕产妇保健	
目标 5A：1990 年到 2015 年，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已经实现
具体目标 5B：到 2015 年使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服务	基本实现 ^②
目标 6：与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疟疾和其它疾病作斗争	
目标 6A：到 2015 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	基本实现 ^③
目标 6B：到 2010 年，实现为所有需要者提供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的治疗	基本实现 ^④
目标 6C：到 2015 年，遏制并开始扭转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发病率	基本实现 ^⑤
目标七：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目标 7A：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政策和计划，扭转环境资源损失趋势	基本实现 ^⑥
目标 7B：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到 2010 年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	没有实现
目标 7C：到 2015 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已经实现
目标 7D：到 2020 年，明显改善约 1 亿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	很有可能
目标八：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注①：2014 年底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为 77253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9%。2003-2014 年，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达 1.37 亿人。

注②：2013 年，中国户籍人口免费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项目人群覆盖率达到 100%，流动人口达到 96%，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89.5%。

注③：2014 年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10.4 万例，年增长率 14.8%，疫情总体上控制在低流行水平，发病率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人病死率由 2003 年的 33.1% 降至 2013 年的 6.6%。

注④：中国自 2004 年开始实施免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截至 2014 年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艾滋病防治服务网络。

注⑤：中国结核病疫情上升势头已经得到有效遏制，疟疾病率显著降低，但近年来慢性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注⑥：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将可持续发展原则全面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国的生态系统总体呈现好转态势，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图-29 中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情况

附录 3：2010-2013 年全球主要基金会可持续发展领域捐赠情况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基金会中心网启动的对全球主要基金会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资助分析中，可以看到全球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资助主要由美国和欧洲的基金会提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包括 14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资助的领导者。

表-2：2010-2013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主要资助者

基金会	2010-2013 年资助总额 (百万美元)	涉及 SDG 目标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16478.11	14
福特基金会	3155.22	14
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	2410.58	4
凯洛格基金会	1740.44	12
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1739.07	5
沃尔顿家族基金会	1657.54	6
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	1314.22	10
荷兰邮政彩票	1277.84	10
大西洋慈善基金会	1250.49	6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

顾问：

王振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Carol FOX 东西方中心特别项目主任

组长：

傅昌波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总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成员：

曹洪民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

王庆泓 美国东西方中心特别项目主任助理

郭 素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合作发展中心总监

程 芬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公益管理部主任

杨方义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金融与社会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孟 烨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合作发展中心国际合作部主管

魏璞祯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家族慈善传承中心助理研究员

周希佳 密涅瓦大学研究生

高煜芳 耶鲁大学林学院博士研究生

方禹同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实习生